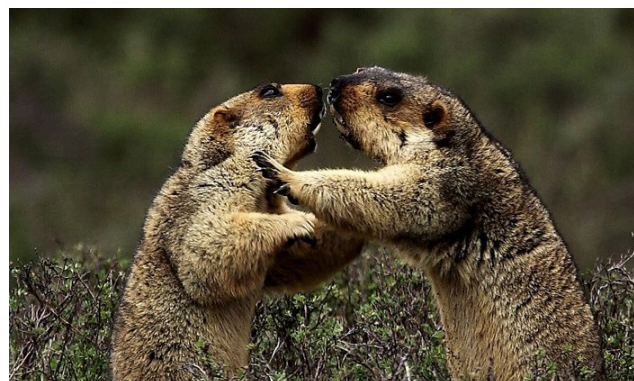


# 110年前，那场在东北爆发的鼠疫

作者：馒头说

1

这一年，是1910年的9月。每年的这个季节，大量猎人涌入位于中国东北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满洲里，开始大规模捕猎一种被称为“旱獭”的动物。旱獭，学名“Marmota bobak”，是松鼠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用我们比较熟悉的称呼，就是“土拨鼠”。旱獭的肉是可食的，脂肪可以入药，但最珍贵的，



还是它身上的这张毛皮。旱獭的毛皮皮质好，坚实耐磨，经过加工后可以和貂皮媲美，所以在20世纪初的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在宣统二年（1910年）这一年，一张旱獭皮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1.2卢布——大致相当于当时的一两白银。仅1910年，从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就达到了250万张。由于每年的9月前是土拨鼠皮毛生长最好的季节，所以人手短缺的俄国人就雇佣了大量华工，一起捕捉旱獭。

那些从直隶和山东被招募过来的中国苦力们，最初并没有什么捕捉旱獭的经验，但好在这个季节的土拨鼠便于捕捉，聪明勤劳的华工很快学会了捕捉的方法。

尤其是他们发现运气好的话，会遇到一种“呆笨”的旱獭：这类旱獭步履踉跄，碰到猎人时既不能跑，也不会叫，而是傻傻地呆在原地，只需要一棒子打死就行。猎人们发现，这类旱獭的眼睛中有乳白色的云状物体，而且会被同类抛弃，不被允许与其他旱獭一起同居一穴。

每每遇到这类旱獭，猎人们就会庆幸自己运气不错。他们也知道，这是一只生病的旱獭，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捕捉到。他们像对待其他旱獭一样，将它们的皮徒手用刀剥下，至于肉，作为一顿改善伙食的大餐。

至于这只旱獭究竟生了什么病，大家并不关心。事实上，以当时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也根本不可能得知旱獭究竟得了什么病。

旱獭得的是一种由耶尔森菌属中的一种引发的烈性传染病。这种传染病，曾在14世纪中期短短六年时间里，导致近3000万欧洲人死亡。它曾被称为“黑死病”，但有更官方的叫法：鼠疫。

2

在那一年，究竟是谁先感染了鼠疫，有多种说法。按照《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的记载，是这样的：“工人张万寿者，向在俄境大乌拉站以招工为业。宣统二年九月初，工棚内暴毙七人。俄人闻之知为疫也，焚其棚屋、逐其工人，并将工人所有衣服行李等件尽行烧毁，以为断绝疫根之计。

大乌拉站距满洲里百三十里，有业木工者二人被逐，于九月十七日由乌拉站来满，寓居铁路界内二道街张姓木铺，二十三日疫发相继死亡。同院田家伙房住客金老耀、郭连印二人遂亦传染于二十三日身死，是为满洲里疫症发现之起源。”

若按这份记载为准，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第一，鼠疫的初发，大概是在1910年9月中旬；第二，初发的地点，是在俄国境内；第三，最初感染鼠疫的，是华工；第四，俄国人已经知道是疫情，而不是一般的传染病，但他们只是做了简单粗暴的驱逐；

第五，在驱逐后，鼠疫被华工带回了满洲里。当然，在当时的第一时间，很多人未必知道感染的就是鼠疫——事实上，致命的细菌还在最先接触旱獭的猎人们身上潜伏，倒是通过交叉感染在木匠们身上爆发了。

20世纪初的那个秋天，广袤的东北大地提供了鼠疫传播的理想环境：天气渐凉，一个旅店的大炕上往往要躺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人，大家互相抱团取暖，房间密闭，空气极不流通；在寒冷的天气洗澡和洗头，对于东北人来说本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不佳的卫生状况加速了细菌的传播；当时无论政府还是民众对“防疫”的意识几乎等于零，各地也没有必要的防疫设施和机构，对现代医学的概念也毫无认识，老百姓生病后甚至会求助于“跳大神”这类封建迷信治病。

尤其关键的是，东北当时拥有中国最完善的铁路系统，在俄国和日本控制下的铁路体系，一开始也没有对疫情有足够的认识，大量已经被细菌感染的旅客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将鼠疫传播向了四面八方。

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一场惨剧开始上演。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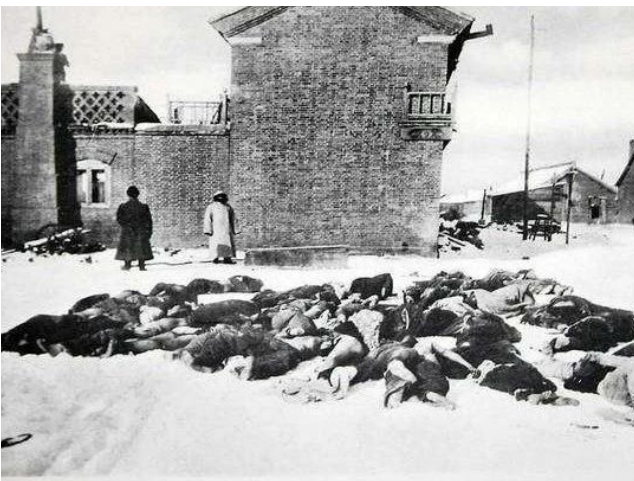
灾难最先爆发的地点，是哈尔滨的傅家甸。

从1910年12月10日开始，一直到1911年1月7日，傅家甸每天都有超过100人死亡。感染此病的人往往在两三天后就胸闷、头痛、呼吸困难、浑身青紫，最后痛苦而死。

关键是，这种疫病的致死率极高——在疫情爆发阶段，傅家甸确认染疫人数为1535人，死亡1535人。

吉林省也未能幸免。1910年12月14日，长春出现首个病例，随后每天因疫病死亡的人数超过50人。

在奉天省的沈阳，1911年1月2日出现首个病例，随后迅速蔓延到城市和农村。有一个男人从沈阳市内回到农



▲当时的东三省，四处可见横尸街头的景象

村，染病而亡。全家七口人在帮他照传统习俗举办葬礼后，几天内相继染病死，只留下一个婴儿。邻居们帮忙埋葬了这一家后，拿走了这家人在屋内的各种物件，随后接连死去，最终除了一名70多岁的老妇人和3名婴儿外，全村150人全部死亡。

一时之间，东三省风声鹤唳，棺材脱销，道路边甚至可以随处看到横躺着的尸体。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朝的中央政府一开始也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直到1月12日北京出现首例病例和1月14日天津出现首例病例后，意识到疫病已经威胁到京畿安全的清政府，终于发布上諭：

“现在东三省鼠疫流行，著予于山海关设局严防，认证经理，毋任传染内地，以为民生。”

但此时已为时已晚。所幸即便是临时抱佛脚，清政府还是拿出了一定的办事效率：立刻开始筹措防疫资金，设立“东北防疫总局”，聘请国内外的防疫专家到东北帮助防疫。

这三项措施的前两项，都是投入钱和精力就可以做到的，但第三项，却没有那么简单解决。

当时，在东北拥有各自势力地盘的俄国和日本，都站出来指责清政府防疫工作指挥不力，进而提出要拥有独揽东三省防疫工作的权力。

防疫需要调动从军队到警察到各个部门，所以不仅仅只是简单的防疫，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年仅31岁的华人被推到了时代舞台的正中央。1910年12月，这位华人被任命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他的名字，叫伍连德。

4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出生于马来西亚。1896年，17岁的伍连德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曼纽尔学



▲伍连德。他出生于马来西亚，但按1909年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规定，父亲出生在中国，即拥有中国国籍，所以伍连德也是中国人。

院，毕业后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随后又到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医院实习和研究，最终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1907年，28岁的伍连德接受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邀请，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院长），个人命运开始与祖国发生关联。

1910年的东北鼠疫爆发后，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洞悉日俄欲借“治疫”之机行统治东北之实，所以力荐由本国国人担任防疫的总医官。

伍连德，就是在施肇基的极力推举之下，走马上任的。

伍连德上任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先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次疫情——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是鼠疫。为此，伍连德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成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医学意义上解剖人体的人。

12月26日晚上，傅家甸有一名嫁给中国人的日籍客棧老板娘染疫暴卒。第二天一早，伍连德和助手就赶到事发地，在贫民区的一栋小楼里开始解剖尸体。

伍连德从死者的右心房抽取了血液样本进行细菌培植和涂片观察，同时通过切开死者的肺脏与脾脏表面提取组织块放入盛有福尔马林液体的容器里。在完成这一切后，伍连德将死者器官复位，缝合好表皮，为之穿戴整齐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棺材中——这一切都是瞒着外界进行的。



▲当时设立的“疑似病院”

在之后的四天时间里，伍连德在实验室里进行了紧张分析和研究。在高倍显微镜下，伍连德看到了所有切片中都出现了成群的鼠疫杆菌，而且是特有的两头着色的卵圆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伍连德提出了这次东北疫情的源头，是一种之前并没有见过的“肺鼠疫”——不同于之前通过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肺鼠疫”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尤其是飞沫传播，所以杀伤力极大。

在搞清楚了疫情的起因之后，伍连德立刻开始着手防疫工作。但是，困难比他想象得要大多。

5

伍连德首先遭遇的，是民众的信任问题。在现代医学尚未普及的那个年代，广大中国人只信中医，认为西医都是“洋人的玩意儿”。疫情爆发之初，东北各地不少中医给出的判断是“戾气致疫”或“干燥致疫”，各种中医“偏方”也开始频频出现，很少有老百姓愿意去西医诊所。而中医们也确实相信自己能够对抗这场疫情，都勇敢地冲到了第一线。

结果，在长春某个10万人口的地区，登记备案的31个中医，有17个染疫而亡，这个结果让老百姓开始涌入伍连德在各地开设的鼠疫医院寻求帮助。

第二个是卫生习惯问题，比如戴口罩。由于“肺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播，所以戴口罩是一项简易却非常有效的防治办法，但当时中国人几乎没有戴口罩的习惯，甚至那些中医在接待病人的时候也不佩戴，这也是造成中医人员大量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伍连德和他的助手们大力提倡每个人都要佩戴一种他发明的简易口罩：用外科手术用的洁白纱布制作，被称为“伍氏口罩”。随着疫情的加重，街上戴口罩的中国人开始多了起来，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戴口罩的正确方法——有的套在脖子上，有的挂在耳朵上——但随着正确佩戴口罩的人慢慢增多，疫情的交叉传播得到了有效遏制。

第三个是习俗问题，比如过年走亲访友。1911年的除夕是1月29日，正值疫情的高发阶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春节要回老家，还要走亲访友，这



▲当时设立的临时消毒所

给疫情的传播提供了最可怕的人传人渠道。为此，伍连德上奏清政府，并请俄国和日本政府配合，严格管控东三省铁路，派人沿途巡查，不允许携带细菌的人群继续流动。此外，伍连德奏请调来了1160名职业军人和600余名警察，进行防疫的专业训练后投入戒严和检查工作。他将这场鼠疫的源头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都委派军队、警察和高级医官分工合作，设立隔离区、消毒区、办公区和医务人员宿舍，密切监控街道上一切流动人员，所有参与防疫工作的人员每天都要进行严格消毒。当然，警察的另一项工作是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弹压部分不肯理解或合作的群众——他们认为政府不让他们走亲访友乃至隔离是“违背人性”和“伤天害理”的。

第四个问题，是社会舆论问题，比如谣言。疫情一发，谣言四起。其中一类谣言，就是这次疫情是来自“邪恶敌人的攻击”，比如说是俄国人或日本人干的。当时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这次的疫情是日本人在东北水井里投毒引发的，目的是“要毒死全部中国人”。

尽管日本当时对中国的东北确实是狼子野心，也确实背后搞过不少小动作，但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细菌攻击，有一条逻辑是说不过去的：当时在东北有大量日本的侨民，他们没必要进行如此“无差别攻击”。

当时的《盛京时报》在1月27日的文章也指出了这条逻辑：“夫疫症为害最烈，中外莫不畏惧，日人亦居奉天，岂独不怕传染乎？是以谣传不辨自明。”

事实上，恰恰是因为俄国和日本在当时的中国东北有大量利益，所以他们反而是最积极的防疫合作者。伍连德也深深认识到了这一点，和俄国与日本援助的医疗力量密切合作。在防疫过程中，甚至出现日本的医官和妻子在照顾中国病人时双双染疫而亡留下三个孤儿的事。

截至1911年3月3日，日本投入东北的防疫经费是1427万日元，俄国是24万卢布。（《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于永敏、刘进、王忠云，《中国科技史料》16卷4期（1995年），66页）

应该说，至少就防疫这件事本身而言，中日俄三国是密切合作的。

（下接第B7版→）